

中日关系书写的一个扭结点

——从日本郑成功研究知识史认识日本民族主义思潮的演进*

寇淑婷

摘要：近三百年来日本学术界对郑成功的研究历程，可分为日本江户时期（1732—1867）的先声期，明治、大正及昭和前期（1868—1945）的发展期，与“二战”后（1945年后）繁荣期三阶段。不同阶段的研究各有侧重，大体可分为“华夷变态”思想史之扭结点的日本郑成功衍生思想研究，身份认同史之扭结点的郑成功历史研究，以及英雄被塑造史之扭结点的日本“郑成功文学”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形成了日本郑成功研究的知识系统。

关键词：日本 郑成功研究 思想研究 历史研究 文学研究

郑成功作为中日关系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中日关系书写的一个扭结点。这里所谓的“扭结点”，是指在中日关系交流史上，中日学者围绕郑成功这一历史人物开展了各种角度的诸如政治、历史、经济贸易、军事、文学、哲学、宗教、文化等各领域的研究，在跨文化对话的过程中形成了相互交织、相互关联、固着的知识场域和言说空间，并且这种对话与交流一直延伸到当下，实现了学术研究与现实意义的对接。这种对接体现为日本郑成功研究是认识日本民族主义^①思

*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重大项目“‘东方学’体系建构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项目编号：14ZB08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获得2016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编号：留金发〔2016〕3100号）的资助。

① “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在参考了各类事典的基础上可总结为：“某一民族或多个民族，为守护生活、生存安全，保持民族或民族间共通的传统、历史、文化、语言、宗教等，发展而形成于国民国家（nation-state），以维持或强化对国内的一致性、对外国的独立性为目标的思想原理、

潮发展演进的路径。因此，观照这一扭结点，不仅能够梳理出一条日本郑成功研究知识史的发展轨迹，反映出日本郑成功研究的变容，也能够呈现出日本民族主义思潮发展演进的过程，成为解读中日关系的一条有效途径。

日本学界的郑成功研究^①肇始于江户时期，距今已有近三百年的学术传统，具有厚重的学术积累，大体上经历了江户时期日本郑成功研究的先声期；明治、大正及昭和前期（1945年前）日本郑成功研究的发展期；“二战”后日本郑成功研究的繁荣期这样一个发展演变历程。在不同历史阶段，日本郑成功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也不尽相同，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同时，涌现出了坪内逍遙、石原道博、齐藤孝治、稻垣孙兵卫、川口长孺、林田芳雄等一批郑成功研究的专家群体。打破日本郑成功研究的历史分期，综观各领域的日本郑成功研究知识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分别为“华夷变态”思想史之扭结点的日本郑成功衍生思想研究、身份认同史之扭结点的日本郑成功历史研究以及英雄被塑造史之扭结点的日本“郑成功文学”研究。

一、“华夷变态”思想史之扭结点：日本郑成功衍生思想研究与日本民族主义

日本郑成功衍生思想研究主要围绕《华夷变态》（1732年）和近

政策或者运动的总称。”（笔者译）参见鈴木貞美：《日本の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平凡社，2015年，第28页。

- ① 关于日本的郑成功研究，日本学者川勝守分四个时期论述了近世、明治维新以后1945年以前、二战后、最近（即到该书出版的1990年代）的郑成功研究与今后的展望，是对日本郑成功研究的综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作者将《国性爺合戦》、《国仙野手柄日記》等文学作品也列为研究之列，混淆了文学与研究的界限，同时，未能在相应的时间跨度内清晰呈现日本郑成功研究的多元化，文献综述不够全面甚至对于日本郑成功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有疏漏，另外该文发表的1993年距今已二十余年，这期间日本郑成功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有待梳理。参见川勝守：《日本における鄭成功研究をめぐって》，《中国研究月报》，1993年6月。此文1994年收录于郑成功与同时代史研究会所编《鄭成功と同時代史研究：目録・解説・展望》。

松门左卫门的《国性爷合战》（1715年）展开。这两部作品均产生于日本江户时期，其中，《华夷变态》由林春胜、林信笃父子编撰，记录了自1644年至1717年长崎奉行上报给德川幕府的中国局势变化报告书，也称之为“唐船风说书”。该书第一卷记载了郑芝龙、郑成功、郑经等郑氏家族与日本幕府的交流史。其中包括郑芝龙的日本请援；芝龙败军；郑彩寄书两篇，一篇请援兵，一篇求通商船；鲁王谕琉球；朱成功（郑成功）献日本书等重要史料，是中日关系研究极具参考价值的文献。该著作所记载内容也揭示出日本德川幕府对于当时中国国内形势的密切关注。可以说，《华夷变态》该著作本身就是对郑成功历史的研究，可视为日本郑成功研究的发端。《华夷变态》序言开篇这样写道：“崇祯登天，弘光陷掳，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①这也是《华夷变态》一书的核心意旨，它揭露了日本幕府试图在“华夷秩序”“失序”状态下重塑新秩序的华夷思想的转变。这种“华夷变态”思想，是日本民族主义意识产生的萌芽。

在《华夷变态》产生之前，日本戏剧家近松的《国性爷合战》（1715年）则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国性爷合战》充斥着对清朝的蔑视及侮辱之词，如形容清朝为“无道无法的畜生国”^②，该剧结尾郑成功驱逐了鞑靼王，占领了南京城，完全歪曲了历史事实。近松对这一史实的歪曲，如果用当时信息传递不发达来解释的话，那么在他后来创作的《国性爷后日合战》（1717年）中，鞑靼王反攻，南京再次沦陷，又是国姓爷郑成功在日本神灵的保佑下，再次夺回南京城，这又作何解释？不仅如此，由于《国性爷合战》的成功，日本出现了“国姓爷文学”热潮，涌现出了一系列《国性爷合战》翻案剧，但是，故事的结尾却几乎完全一致，郑成功攻陷南京的情节没有改变。从这一点看，《国性爷合战》不仅是一部戏剧，也可称为一部思想史。“日本文化与其他各国文化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在于日本人的思想主要是通

① 林春勝，林信篤：《華夷変態》，東京：東洋文庫，1981年，第1頁。

② 近松門左衛門：《国性爺合戦》，《近松全集》（第九卷），東京：岩波書店，1988年，第636頁。

过文学的方式来表现和传达的。”^①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性爷合战》唤起了日本人的“国家”、“民族”意识。日本学者吉野耕作曾指出:“近松的《国性爷合战》1715年在大阪竹本座初次公演,后来连续17个月常演不衰,次年又被编成歌舞伎。从这一盛况可以推测,在大阪的町人中间已存在意识到与中国相对的日本存在这一族群感情。”^②这种族群感情、族群意识是日本民族主义产生的萌芽,它使日本人意识到了与中国不同的日本的存在。

对此,日本学者也有深刻认同。松本新八郎《〈国性爺合戦〉——その民族観について》^③(《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月報》28,岩波書店,1959年),从近松的《国性爷合战》出发,指出近松具有“华夷思想”的国家意识。江藤淳《“国性爺”と国家意識・近松門左衛門(3)——文学史に関するノート(連載第八回)一》(《文学界》20(1),1966年1月),指出江户时期爆发的大规模的诸国信徒参拜伊势神宫的热潮,是民众无意识中对“故乡”即“国家”的追寻,《国性爷合战》的成功正是当时日本人内心状态的写照,它影射了元禄时期日本人的国家意识。小笠原幹夫《近松の華夷思想——〈国性爺合戦〉をめぐる》,(《作陽音楽大学・作陽短期大学研究紀要》24(1),1991年),以《国性爷合战》为中心,从锁国与海外雄飞的志向、郑氏父子的“日本乞师”以及幕府的回应、浪人问题及近松的出身、“华夷思想”与日本主义四方面论述了近松华夷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日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小森阳一、内藤千珠子《〈国性爺合戦〉と伝説の記憶》(《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2月),论述了日本对郑成功的政治利用过程,指出郑成功是日本对中国台湾地区殖民统治正统

① 王向远:《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日本文学研究百年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② 〔日〕吉野耕作:《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刘克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3—34页。

③ 为了方便表述,本文出现的日文文献的标点符号转换成了相应的中文标点符号。例如,《〈国性爺合戦〉——その民族観について》,日文文献为『国性爺合戦』——その民族観について。

化的工具。井上厚史《〈国性爺合戦〉から〈漢国無体 此奴和日本〉へ——江戸時代における華夷観の変容》（《同志社国文学》（58），2003年3月），以《国性爺合战》和《汉国无体 此奴和日本》作为切入点，论述了江戸时代日本华夷观的发展。他指出，17世纪前半期到18世纪后半期的150余年间，日本华夷观的变容经历了两次转折，分别为17世纪后半期“日本、中国对等”的表象期，以及18世纪后半期的“日本优越中国”的表象期。后者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华夷观，而《国性爺合战》和《汉国无体 此奴和日本》正是这一时期华夷观逆转现象的象征。这一时期，诞生了吉田松阴的“尊皇攘夷”论，日本爆发了“尊皇攘夷”运动，近松在《国性爺合战》中所刻画的鞑靼国（清朝）“无道无法迥异的畜生国”的“他者像”也成为日本侵略亚洲的口实。大桥里沙《近松の国性爺像とその創作意識》（《学芸国語国文学》（41），2009年3月）、崔官《鄭成功から和藤内へ——近松の〈国性爺合戦〉を中心に》（《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8》，2012年2月），也论述了近松《国性爺合战》所体现的以日本为中心的民族意识。

另外，围绕《华夷变态》所载明朝末期及郑氏父子的日本请援，后世学者也展开了深入研究。稻垣孙兵卫的《鄭成功》（台湾经世新报社发行，1929年），是一部深入研究郑成功的著作，对郑成功的日本请援也有论述，具有重要价值。关于郑成功及明末清初日本请援的研究石原道博可谓权威。自1936年至1945年石原道博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多部相关论文，这些论文最终以著作的形式出版。石原道博的《鄭成功》（三省堂刊，1942年）、《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の研究》（富山房，1945年），从明末周鹤芝、冯京第的日本乞师；郑芝龙父子的日本乞师；明末的日本乞师与郑经；日本乞师失败的原因；明末清初请援罗马始末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对于日本乞师失败的原因，石原道博首先批判了黄宗义关于日本拒绝出兵的原因“不见兵革之事”、“多忘武备”，石原道博指出，日本之所以拒绝出兵，原因在于首先明朝形势复杂，明朝遗王、遗臣矛盾冲突激烈，各方势力分裂严重，

没有绝对的领导核心,缺乏灭私奉公、同心协力坚决抗清的态度;另外,从请援的经过来看,乞师的目的是为了牵制清朝,对于请援行动缺乏计划性、组织性,是个别的、断续的行动。同时,郑芝龙降清,使日本幕府对明朝陷于失望的境地^①。

要言之,《国性爷合战》所体现的近松的“华夷思想”正是日本国家意识和社会集体意识的反映,《华夷变态》则充分暴露了德川幕府试图重新建立“华夷秩序”的政治理想。从《国性爷合战》与《华夷变态》文本及日本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江户时期日本民族主义的萌芽已经产生。虽然,“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一般认为产生于近代,然而对此,学界也存在质疑的声音。“脱胎于‘民族’(nation)的思想或感情的民族主义,若‘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话,那么即使没有‘民族主义’这一称呼,与此相同意义的后来成为‘民族主义’的东西的民族主义的萌芽,应该自古以来就存在。”^②针对日本民族主义产生的过程,日本著名学者铃木贞美认为日本最初的民族主义产生于平安初期,佛教故事集《日本灵异记》记录的与日本相区别的其他国家的佛教故事,如“天竺”(印度)、“唐土”(中国)、“百济”(朝鲜)是日本民族主义的表现^③。那么,产生于日本江户时期的《国性爷合战》、《华夷变态》所反映的日本民族主义意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以说,日本学者基于日本郑成功衍生思想的研究,是一部“华夷变态”的思想史,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民族主义意识的萌动。

二、身份认同史之扭结点：日本郑成功历史研究与日本民族主义

日本郑成功历史研究伴随着日本对于郑成功的身份认同而展开,

① 石原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の研究》,東京:富山房,1945年,第120—123页。

② 铃木贞美:《日本の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平凡社,2015年,第29页。

③ 同上书,第56页。

日本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同体现在“血缘认同”和“文化认同”两个方面。

郑成功传记是郑成功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早在江户时期，就出现了郑成功传记，这一时期也是日本郑成功研究的先声期。1797年，朝川善庵的《郑将军成功传碑》是日本第一部郑成功传，全文用汉文写成，对郑成功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论述与评价，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论断。“吾大东日本之人，以勇武胜于万国，世所知也。夫以匹夫驰勇名于西洋，耀武威于天下者……其并勇与义而有之，吾郑将军成功，盖其人乎？”^①作者站在日本立场对郑成功评价甚高，“驰勇名于西洋”、“耀武威于天下”，且兼具“勇”与“义”，但这一切似乎都归功于日本，因为郑成功乃“吾大东日本之人”。朝川善庵对郑成功的“吾大东日本之人”的身份认同，体现了日本对郑成功的“血缘认同”。日本学者国弘正雄指出，“使日本人成为日本人的，最为重要的是‘血’”^②。对郑成功而言，虽为中日“混血”，但毕竟身体里流淌着一部分日本人的血，这是日本学者将其认同为日本人的关键遗传因素。对此，吉野耕作在参考了前述论述后指出：“‘日本人的血’是社会性、文化性构件，除此以外，别无他物。”朝川善庵对郑成功的“吾大东日本之人”的日本人身份认同，是日本民族主义意识的体现，“民族自我认同意识通过‘血’而被象征化的情况并非是日本特有的。族群自我认同意识的人种化在东亚是可以相当普遍观察到的现象。”^③

进入明治时期，出现了大量以郑成功命名的专著。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同则转向“文化认同”，认为郑成功具有“日本魂”，是日本武士精神的体现。染崎延房的《台湾外記：一名・国姓爷》（永保堂，1874年）就是其中一部。作者认为郑成功具有“日本魂”，

① 日本随笔编辑部：《善庵随笔》，《日本随笔大成》，东京：吉川弘文馆，1975年，第473页。

② 国弘正雄：《国際英語のすすめ》，東京：実業之日本社，1974年，第34页。

③ 〔日〕吉野耕作：《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刘克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25页。

郑氏三代颇具“楠氏”遗风。这里的“楠氏”指日本南北朝时代河内国的武家豪族楠木正成氏，此说法是指郑氏三代具有武士精神，这与前述朝川善庵对郑成功的评价不谋而合，二者从不同角度对郑成功的日本人身份进行了认同，体现了强烈的日本民族主义特点。

日本学者对郑成功日本人身份的认同，标志着日本民族主义已经产生，并逐渐膨胀，最终走向了军国主义。丸山正彦的《台湾開創鄭成功》（嵩山房，1895年），该书出现的契机恰好与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地区的时间吻合，体现了日本殖民统治阶级试图通过郑成功“同化”台湾地区民众的政治诉求。这一时期的相关著作还有宫崎来城的《鄭成功》（大学館，1903年），是一部详细论述郑氏三代台湾地区统治史的著作。田中善立的《台湾と南方支那》（新修養社，1913年），作者重点研究了在台湾地区殖民统治的优点及不足，并指出对中国南部地区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存在的各种问题。该著作无疑为日本的在台湾地区的殖民统治提供了学术支持，反映了当时日本殖民统治者的主流意识以及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为了从文化上强化郑成功的日本人身份，日本殖民统治者利用台湾地区民众对郑成功的信仰，来实现其台湾地区殖民统治正当化的政治理想。相关研究有，营浩二《台湾最初の神社御祭神とナショナリティ——台南・旧開山神社（鄭成功廟）について》（《国学院大学日本文化研究紀要》（88），2001年9月）、松田吉郎《阿里山ツォウ族の鄭成功・呉鳳伝説について》（《現代台湾研究》（23），2002年7月）等。呉華君《台湾総督府領台初頭の民情認識と“鄭成功”顕彰—“同化”と“旧慣保存”の關係性に対する考察として》（《年報日本思想史》2，2003年3月），以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地区初期实行的“同化”政策与“旧惯保存”政策作为考察点，指出在同化政策中因为郑成功的日本血统，成为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地区统治正统化的工具，郑成功也成为寻求与台湾地区民众共同情感的根源，即同为清朝敌人。对延平郡王祠的改称，公学校教材中导入郑成功的故事，以及儒学的运用，逐步实现其“同化”策略。

同时，“旧惯保存”是进行“同化”的另一种方式。这些都是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地区共同体意识建构的过程。

以上日本学者的郑成功历史研究，揭示了日本对于郑成功从血缘和文化两方面进行身份认同的历史，也揭示了日本民族主义产生、发展及膨胀的过程。进入“二战”后，日本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同则发生了改变。

“二战”后，日本的郑成功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研究高潮。郑成功与同时代史研究会编的《鄭成功と同時代史研究：目録・解説・展望》（鄭成功と同時代史研究会，1994年）、林田芳雄《鄭氏台湾史—鄭成功三代の興亡実紀》（汲古書院，2003年）、齐藤孝治《秘話 鄭成功異聞》（いなほ書房，2013年）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森本繁《台湾の開祖 国姓爺鄭成功》（国书刊行会，2014年），由地之卷·郑芝龙的南海称霸、空之卷·国姓爷郑成功的登场、天之卷·国姓爷的台湾攻略三部分构成。该书在郑成功登场部分，有这样一段描写：七岁的郑成功即将告别母亲和祖父回明朝，临别前，祖父用朱熹的诗勉励郑成功，“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讲到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对义士岳飞将军的盛赞时，郑成功对岳飞的《满江红》脱口而出^①。显然，郑成功是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成长的，而且拥有一颗岳飞式的精忠报国的赤子之心。这与朝川善庵的“吾大东日本之人”，染崎延房所述郑成功具有“日本魂”，具有“楠氏”遗风的武士精神的论调截然不同，“战后”日本对郑成功身份认同的变化可见一斑。

“‘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呈现退潮，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20世纪60年代以后，又增加了第三方面，即经济奇迹带来的经济大国形象。”^②日本学者的郑成功历史研究体现了“战后”日本对郑成功身份认同的改变，同时，日本郑成功研究领

① 森本繁：《台湾の開祖 国姓爺鄭成功》，东京：国书刊行会，2014年，第128—129页。

② 李寒梅：《日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11—212页。

域也不断拓展，扩大到了郑成功母亲，甚至拓展到了郑氏集团海外贸易的研究，体现了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主要学术论文有，藤塚隣《鄭成功母子の図をめぐる日鮮明清の文化交流》（《日鮮清の文化交流》，1947年）、平田澄子《近松浄瑠璃の“女性”——底意をあらはす女たち》（《日本文学》46（10），1997年10月）等，论述了近松所塑造的郑成功母亲是日本理想女性形象。石原道博的《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の研究》（富山房，1945年）等，对郑芝龙的日本贸易和南海贸易进行了论述。

以上日本学者的郑成功历史研究，是日本对于郑成功的“身份认同史”，日本学者从“血缘认同”、“文化认同”的角度对郑成功的日本人身份进行了论证。郑成功的“大东日本之人”、“日本魂”的身份认同以及日本占据台湾地区时期郑成功信仰被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政治利用，充分体现了日本民族主义的产生以及发展膨胀的过程。“二战”后，随着日本民族主义的退潮，日本学者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同也发生了转变，强调郑成功的中国文化养成要素。同时，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的郑成功研究也呈现“多元化”特点，从郑成功历史研究，扩大到郑成功母亲、郑氏集团海外贸易等，体现了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以及日本“战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思想。总之，日本学者基于郑成功历史研究的“身份认同史”，体现了日本民族主义产生、发展以及膨胀、退潮的演变过程。

三、英雄被塑造史之扭结点：日本“郑成功文学” 研究与日本民族主义

近松《国姓爷合战》的成功，日本涌现出“国姓爷文学”热潮，日本文人创作了大量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笔者将其定义为日本的“郑成功文学”^①。“郑成功文学”

^① 参见寇淑婷、岛村辉：《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形成、流变及其发展态势》，《东疆学刊》，2017年第3期。

是指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相对于日本文学中产生的“国姓爷文学”热潮而言，将“国姓爷文学”的外延扩大，它包含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及日本、荷兰等所有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定义为“郑成功文学”，是因为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不同，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中国人对郑成功的认同是“郑成功”而非“国姓爷”，受到近松《国性爷合战》的影响，日本人对郑成功的认同是“国姓爷”而非“郑成功”。文学是文化的重要因素，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日本学者对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研究知识史，可以说是一部英雄被塑造的历史。

近松《国性爷合战》所塑造的国姓爷“和藤内”形象，几乎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国姓爷”形象。“和”代指日本，“藤”与“唐”的发音相同，代指“中国”，“和藤内”这一称呼兼具日本与中国的特色，是郑成功形象日本变容的体现，也是近松从日本的角度对郑成功形象的建构。日本文人以《国性爷合战》为原典，创作了大量翻案剧，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性爷合战》及其翻案剧的上演记录^①可知，从1716年开始，江户时期，《国性爷合战》共上演115场；明治时期至1973年，上演94场；这期间《国性爷合战》的翻案剧上演53场。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国姓爷”在日本风靡的程度。直至今日，《国性爷合战》作为保留的经典戏剧，日本的国立剧场基本每年都会定期上演。并且，《国性爷合战》的戏剧形式——净琉璃剧和歌舞伎，都是日本特有的民族艺术，日本民族艺术的表现形式加上日本的“国姓爷”形象，使近松的《国性爷合战》经久不衰。

《国性爷合战》表现了近松的“华夷思想”及“国家意识”，体现了日本民族主义意识的萌动，前述（本文第一部分）日本学者的研究已经充分证实。随着“二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退潮，日本学者的“郑成功文学”研究，体现为从民族艺术的角度对《国性爷合战》及其翻

^① 参见尾崎秀树：《“国性（姓）爺”上演記録》，鄭成功と同時代史研究会编：《鄭成功と同時代史研究 目録・解説・展望》，長崎：鄭成功と同時代史研究会，1994年，第113—152页。

案剧的研究。

首先表现在对《国性爷合战》文学文本及其翻案剧的研究。大正及昭和前期，主要围绕《国性爷合战》文学文本与《明清斗记》文本、《国性爷御前军谈》文本异同进行了对比研究，坪内逍遥《近松之研究》（春陽堂，1900年）、野間光辰《〈国姓爺御前軍談〉と〈国姓爺合戦〉の原拠について》（京都帝国大学国文学会编《京都帝国大学国文学会二十五周年記念論文集》，星野書店，1934年）、豊竹古靱太夫《国性爺合戦と日本の母》（《浄瑠璃雑誌》424，1940年）、野原光辰《〈明清闘記〉と近松の〈国性爺合戦〉》（《国語国文》，1940年1月），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成果。

“二战”结束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日本学者大多从作品论的角度，对《国性爷合战》的特点及其受到日本古典文学的影响等方面作了论述，主要有長谷川强《浮世草子の通俗軍談利用と〈国性爺合戦〉》（《国語国文学研究》2，1966年12月），对近松的《国性爷合战》与浮世草子的通俗军谈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国性爷后日合战》受到《三国志》、《太平记》等军记物语的影响。同时代的其他作品如江岛其碯的《国性爷明朝太平记》等也是如此。佐藤彰《〈国性爺合戦〉の評価（作品論の新視角・近松）》（《日本文学》21（6），1972年6月），指出《国性爷合战》具有时代净琉璃所具有的“公的秩序”如“国家安全、国民繁昌、五谷丰饶”等以及世话净琉璃所具有的“私的人类命运”的特点。信多純一《〈国性爺合戦〉の竜虎》（《語文》（49），1987年9月），论述了近松的《国性爷合战》中和藤内“猎虎”等场面受到了谣曲《龙虎》的影响。神谷勝広《豆本〈国性爺合戦〉——広範な流布の可能性》（《演劇研究会会報》（31），2005年6月），比较了豆本《国性爷合战》、豆本《和藤内》与近松的《国性爷合战》的不同，指出豆本《国性爷合战》的出现，使国姓爷的故事得以广泛流传。神谷勝広《近松と〈絵本宝鑑〉》（《日本文学》46（12），1997年12月），指出《国性

爷合战》在情节上借鉴了《绘本宝鉴》。松田存《近松“国性爺合戦”着想攷》（《二松学舎大学論集》43，2000年3月），指出《国性爷合战》受到了谣曲《唐船》的影响，该剧的五段式构造也受到了世阿弥能乐理论的影响。

围绕《国性爷合战》的翻案剧，日本学者也展开了研究，如倉員正江《〈国性爺明朝太平記〉の方法：近松と其磧との間》（《京都語文》7，2001年5月），从《翁草》所载日本俳人神泽杜口对江岛其磧及近松的评价为切入点，比较了其磧的《国性爺明朝太平记》与近松《国性爷合战》的关联与不同。

另外，围绕《国性爷合战》的艺术形式，日本学者从戏剧特点、戏剧构成、戏剧表现方法等角度进行了论述。主要成果有：三田村鳶魚《国性爺合戦》（《史実より観た歌舞伎芝居》蒿文堂，1923年）、土方与志《〈国性爺合戦〉上演に際して》（《築地小劇場》，1928年10号）、小山内薫《〈国性爺合戦〉改作追記》（《築地小劇場》，1928年10号）、久保栄《鄭芝龍と鄭成功》（《築地小劇場》，1928年10号）、河竹繁俊《〈国性爺合戦〉の味》（《文学》（10），1952年10月）、田中喜一《日本の新劇と演劇伝統：小山内薫〈国性爺合戦〉をめぐって》（《日本文学》6（4），1957年4月）、森修《作品構造の分析（戯曲構造）——〈国性爺合戦〉》（《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15（9），1970年7月）、朝田祥次郎《人形劇の創作技法 VI：〈国性爺合戦〉の場合（1）》（《神戸大学教育学部研究集録》，1973年3月）、曾田秀彦《“国民演劇”と小山内薫——古劇研究会から〈国性爺合戦〉まで》（《文芸研究》（41），1979年3月）等。千葉篤《〈国性爺合戦〉について》（《文学研究》（53），1981年6月）、鳥居フミ子《〈国性爺合戦〉——からくり・手妻の“国性爺”》（《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30（2），1985年2月），指出了《国性爷合战》成功的原因。小藤井康生《〈国性爺合戦〉のバロック性》（《表現文化1》，2006年3月），指出《国性爷合战》

是近松具有代表性的巴洛克净琉璃。

再者,日本学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日本的“郑成功文学”的研究,已经开始。山本治夫《国姓爷(郑成功)文学の比較文学的研究》(1)(《福岡大学人文論叢》,1975年3月)等,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成果,作者论述了国姓爷这一研究课题的比较文学轮廓,从国际性、海洋性、机略和节义四方面论述了郑成功伟大成就成立的四要素,并从海洋、海洋文学的角度阐述了东西文学的典型,即达伽马文学与国姓爷文学的异同,指出了日本文学传统中存在对海洋的否定与恐怖。

以上日本学者的“郑成功文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二战”后,近松《国性爷合战》所塑造的“和藤内”形象,成为日本“郑成功文学”中“国姓爷”形象的典范。日本文人对《国性爷合战》翻案剧的创作,使这一形象得以流传百年而经久不衰。从日本学者的“郑成功文学”研究可以看出,《国性爷合战》体现了江户时期日本民族主义意识的萌动,1945年后,随着日本民族主义的退潮,日本学者的“郑成功文学”研究以立足于民族艺术本身的研究为主,主要对《国性爷合战》及其翻案剧以及《国性爷合战》独特的戏剧艺术形式进行了研究。总体来讲,日本学者围绕“国姓爷”展开的“郑成功文学”研究知识史,是一部英雄被塑造的历史。但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研究成果主要局限在对《国性爷合战》及其翻案剧的研究,近代以来的日本“郑成功文学”研究尚未系统展开,为后世学者的日本郑成功研究提供了可能的研究空间。

综观绵亘近三百年的日本郑成功研究知识史,体现了日本郑成功研究由江户时期(1732—1867)的先声期,到明治、大正及昭和前期(1868—1945)的发展期,再到“二战”结束(1945年)以来的繁荣期的发展演变过程。日本学者围绕“郑成功”这一中日关系的扭结点,开展了多领域、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日本学者的郑成功研究揭示出了日本郑成功研究知识史的构成,即“华夷变态”思想史之扭结点

的日本郑成功衍生思想研究；身份认同史之扭结点的郑成功历史研究以及英雄被塑造史之扭结点的日本“郑成功文学”研究三个方面。日本郑成功研究知识史是认识日本民族主义发展演进的路径，具体表现为以《国姓爷合战》和《华夷变态》为中心的“华夷变态”思想史，体现了江户时期日本民族主义意识的萌动；日本学者对郑成功身份认同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血缘认同”和“文化认同”两个方面，日本对郑成功身份认同的变化，体现出日本民族主义发生、发展及膨胀的过程，“二战”后，随着日本民族主义的退潮，日本对郑成功身份认同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强调郑成功作为英雄的中国文化养成要素；日本学者的“郑成功文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战后”，随着日本民族主义的退潮，日本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国姓爷合战》及其翻案剧展开，从民族艺术的角度对近松所塑造的“国姓爷”形象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体现了日本郑成功研究的“多元化”特点。正因为日本郑成功研究的“多元化”，日本学界的郑成功研究并不是都朝着日本民族主义“一元化”方向发展，也存在不同的声音。